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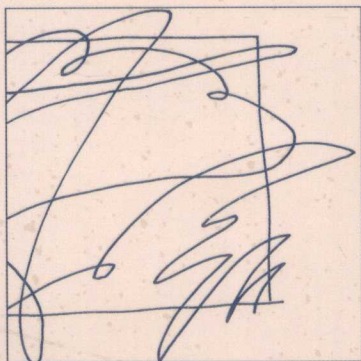


资本主义研究丛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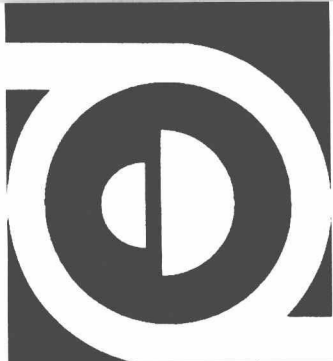
欧洲资本主义的未来

THE FUTURES OF
EUROPEAN CAPITALISM

〔美〕薇安·A.施密特 (Vivien A. Schmidt) / 著
张敏 薛彦平 / 译
薛彦平 / 校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资本主义研究丛书

欧洲资本主义的未来

THE FUTURES OF EUROPEAN CAPITALISM

[美] 薇安·A.施密特(Vivien A. Schmidt)/著

张敏 薛彦平/译

薛彦平/校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欧洲资本主义的未来 / (美) 施密特 (Schmidt, V. A.) 著;
张敏, 薛彦平译.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0. 4

(资本主义研究丛书)

ISBN 978 - 7 - 5097 - 1376 - 1

I. ①欧… II. ①施… ②张… ③薛… III. ①资本主义经济 - 研究 - 欧洲 IV. ①F1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045728 号

· 资本主义研究丛书 ·

欧洲资本主义的未来

著 者 / [美] 薇安·A. 施密特 (Vivien A. Schmidt)

译 者 / 张 敏 薛彦平

校 者 / 薛彦平

出 版 人 / 谢寿光

总 编 辑 / 邹东涛

出 版 者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地 址 / 北京市西城区北三环中路甲 29 号院 3 号楼华龙大厦

邮政编码 / 100029 网址 / <http://www.ssap.com.cn>

网站支持 / (010) 59367077

责任部门 / 编译中心 (010) 59367139

电子信箱 / bianyibu@ssap.cn

项目经理 / 祝得彬

责任编辑 / 曹义恒

责任校对 / 李海云

责任印制 / 蔡 静 董 然 米 扬

总 经 销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发行部

(010) 59367080 59367097

经 销 / 各地书店

读者服务 / 读者服务中心 (010) 59367028

排 版 / 北京中文天地文化艺术有限公司

印 刷 / 北京季蜂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 787mm × 1092mm 1/20

印 张 / 23.2 字数 / 330 千字

版 次 / 2010 年 4 月第 1 版 印次 / 2010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 - 7 - 5097 - 1376 - 1

著作权合同 / 图字 01 - 2009 - 7405 号

登 记 号

定 价 / 49.00 元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
请与本社读者服务中心联系更换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 V. A. Schmidt, 2002

“THE FUTURES OF EUROPEAN CAPITALISM” was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English in 2002. This translation is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本书根据牛津大学出版社 2002 年版译出

本书是中国社会科学院 2009 年度重大（A 类）课题
“欧盟国家经济改革的理论与实践”的中期成果之一。

特此感谢以下课题组成员：

裘元伦研究员 顾俊礼研究员 王 鹤研究员
赵俊杰研究员 薛彦平研究员 张敏副研究员
张 宁博士 蒋 尉博士

新版《资本主义研究丛书》 出版者的话

《资本主义研究丛书》自五年前推出以来，由于其选材精当、内容丰富、观点多样而受到学术界和广大读者的认同和厚爱，始终畅销不衰，其中多部著作已数次再版，成为一个重要品牌。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世人对资本主义的历史进程及其发展变化的深刻关注。

资本主义的发展，从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算起，已有 360 多年的历史。不言而喻，作为学术研究的对象，我们既应该研究它的长达几百年的历史进程，又应该探索其在各个不同时期或阶段的发展变化及其特征。但世人最为关注的当是同他们关系最为密切和直接的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发展。在经济全球化趋势日益加速的当今世界中，世界所有国家无不处于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的运动范围之内。中国作为世界贸易组织的成员，要参与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的运动，就需要像其每个成员一样恪守这个体系的市场规则，进行竞争和合作。认真了解和研究当代资本主义及其运动态势，成为一种迫切需要。

当代资本主义作为一个新的历史阶段，以其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的进步、社会生产力的质的飞跃、社会结构的深层变动而为世

人所瞩目。与此相联系，资本主义世界特别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经济、政治、社会等诸方面出现了无可否认的新现象和新变革。具体地说，进入 20 世纪以后，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其制度允许的范围内采取了一系列政策性调整措施。在经济发展层面上，在当代科学技术革命的一次又一次的突破性进步浪潮推动下，保持了较长时期的相对稳定增长，今天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同 20 世纪初相比，提高了约 100 倍，大幅度地增强了其综合国力。在产业和劳动力结构层面上，出现了服务化、信息化和高科技化的趋势，劳动者队伍走向知识化、脑力化、多层次化，其整体的文化和科学技术素质日益提高，以知识分子为主的中间阶层不断扩大。在运作体制层面上，国家垄断逐步转向国际垄断，国家利用各种财政和金融杠杆来调节国民经济的运行，并推行私有化和兼并等一系列手段来实现跨国资本的垄断。在社会关系层面上，国家通过税收、福利政策、改善企业组织结构、调节社会再分配等措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社会矛盾，保持了社会的稳定。在资本的国际化层面上，吸收和利用当代科学技术发展的最新成果，拓展国际贸易的新空间，促进了生产经营、资本流动、金融活动的自由化和国际化，推动了经济全球化趋势。

就国际学术界对当代资本主义的认识和界说而言，可谓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先后出现了“晚期资本主义”、“保守资本主义”、“新资本主义”、“人民资本主义”、“股票资本主义”、“福利资本主义”、“后工业社会”、“第三次浪潮”、“信息社会”等学说和理论。而自 20 世纪 80 年代末以来，新自由主义理论上升为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特别是美国占主流地位的学说。新自由主义理论强调，资本主义的自由化、市场化、私有化和全球化是当代世界经济、政治和文化三重体制发展的基本原理，或者甚至可

以说是普遍有效的灵丹妙药。但另一方面，在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后曾一度比较沉寂的对于当代资本主义的批判，近年来再度日趋活跃。针对新自由主义这种“市场原教旨主义”政策和金钱“拜物教”所造成的贫富差距日趋加剧、贫困化现象愈益严重、失业率和社会犯罪率激增、经济主权不断弱化等恶果，把当代资本主义形象地比作“绞肉机”、“疯狂的赌场”、“金融机器”等论说，以其富有说服力的事实论据，引起了广泛的社会反响。有的论者认为，断言只要实行私有化和自由化，市场似乎就能自动地解决经济发展的一切问题，这种观点是一种新帝国主义理论，是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迫使发展中国家开放市场的敲门砖。即使是诸如斯蒂格利茨那样的美国著名经济学家，也恳切地指出新自由主义的这种观点至少是不完整的，或者甚至是一种误导。可以说，拉丁美洲一些国家当前出现的深刻经济危机和社会动荡就是“市场原教旨主义”危害性的佐证。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经过经验的总结和理论的反思，西方的左翼理论家们进一步加深了对于马克思主义及其社会批判使命的本质的认识和信念，以犀利的文笔剖析了资本主义的发展历史和现实境遇，揭示了在当代资本主义繁荣背后的种种严重危机和异化现象，深刻地指出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的主要论断非但没有过时，而且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清晰地显示出其真理性和有效性。他们同所谓资本主义是“历史的终结”的论调针锋相对，提出了“资本主义的终结”和“自由主义市场经济的终曲”的观点，并且强调必须跳出资本主义思维的定式，去设想人类的未来。

不言而喻，当代资本主义是多样性的统一。资本主义各国的具体情况及其历史和现实发展各不相同，它们在不同时期所采取的政策措施也有所区别。正因为如此，欧洲的一些理论家提出了诸如“莱茵模式”即欧洲模式与“盎格鲁—撒克逊模式”即美

国模式的对立，以及“资本主义反对资本主义”之说。国际学术界的各派观点尽管大都认为资本主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发生了重大变化，但对于以什么样的尺度和标准来衡量这样的变化，是否存在由量至质的飞跃，则由于立场、方法、视角，以及社会、经济、历史背景的不同导致了分歧和差异，这是毫不足怪的。当代资本主义作为我们同时代的社会发展过程，对于它的研究完全是开放的。

我国学术界近年来对于当代资本主义的研究取得了长足的新的进展，对当代资本主义的新的变化及其广度和深度、产生这些变化的原因、经济全球化与当代资本主义的关系、当代资本主义的性质及其未来发展趋势等问题，进行了多视角的、客观的认真分析和论述。坚持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则，归根结底就是要坚持实事求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实践，要求我们善于总结经验教训，善于学习和借鉴他国的经验，其中包括资本主义国家先进的科学技术以及企业管理等对我们有用的经验。但这不是唯一的目的。马克思主义的本质是革命的和批判的。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研究当代资本主义，还要求我们具有科学的态度，认真探索其演变规律，以批判的眼光来看待其发展。应该看到，当代资本主义的经济、科学技术和物质文化的繁荣现象乃是其自我改良和改善的表现，并没有触动资本主义统治的根基，也没有改变资本主义制度的性质及其固有的基本矛盾。闭目塞听，否定资本主义的一切，这种极端教条主义固然是错误和有害的。但反过来走向另一个极端，也是违背科学的和不可取的。我们必须加强对当代资本主义自我调节和发展的研究，作出富有说服力的理论分析，进一步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但不能因为资本主义在具体演进中产生的一些繁荣现象而否认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科学论断。

一些西方左翼学者在总结西方社会主义运动遭受挫折的经验教训时，曾深有感慨地说：“我们生活在资本主义世界，却并不了解它。”这一方面说明违背实事求是原则的教条主义危害之烈，另一方面也启示我们，当代资本主义作为一个发展和运动过程，有其固有的动态性和复杂性。坚持实事求是原则，就必须充分掌握资料，兼听各种不同的意见和观点。有比较才有鉴别和科学分析。发扬学术民主，倡导不同学派和观点的争鸣，是保障学术发展和繁荣的基本条件。《资本主义研究丛书》至今已经出版了数十种。我们将继续本着以往的宗旨和精神，精心选材，优先选择和出版具有代表性和广泛影响的论著。同时，只要论证有据、资料确凿、言之成理的有关著述，无论中外，即使是一家之言，也均在本丛书兼收之列，以期为我国最广大的研究者和读者提供尽可能完整的参照，来进一步深入了解和认识当代资本主义的面貌及其未来走向。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4年元月

序 言

20世纪90年代中期，当我第一次开始撰写关于全球化和欧洲一体化对各国经济影响的文章时，全球化已经成为人们讨论的重要话题。人们提出的众多担忧包括：如何约束金融市场和跨国公司权力；如何避免在环境、劳工和社会标准上的“竞次竞争”（race to the bottom）（降低环境、劳工和社会标准）；随着国家主权和民主受到威胁，如何面对民族国家开始解体的现象。毫无疑问，欧洲化是迄今为止最重要的超国家实践，这个进程过了较长的时间才受到人们的关注。有人指责说，欧洲化为成员国强制确立了不现实的经济与货币目标，因而加剧了成员国的失业和社会排斥（social exclusion）问题。然而，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人对全球化和欧洲化对欧盟成员国的影响作出过客观和深刻的评价。本书的目的就是通过法国、英国和德国三个国家的情况来解决这个问题。

我在本书中提出的论点是：全球化和欧洲化是推动变革的重

要的经济、制度和思想力量，但全球化和欧洲化并没有造成结果上的趋同。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全球化和欧洲化带来的压力面前，欧洲所有国家确实改变了各自的经济政策、经济实践和政策辩论内容。然而，这些国家面临的压力在时间上、程度上不同，其对压力的反应不同，造成的后果就更不同。虽然所有国家都采取了经济自由化政策，但这些政策仍然存在差异，只不过差异有所缩小而已；各国的实践继续沿着不同的方向发展，但差别有所缩小；各国的政策辩论内容不仅存在差异，而且这种差异还非常显著。我发现，在本书讨论的三个国家中，法国经历的调整量最大，也最有间断性，在全球化与欧洲一体化面前，法国不得不比其他国家更多地改变其传统政策和实践，但其公共话语却缺乏法理基础（legitimizing）的充分支持。相反，英国应对全球化压力的调整开始较早，随后开始的公共话语成功地阐明了政策和实践变革的合理性，多数变革不仅满足了欧洲化的未来要求而且也符合英国的传统。德国的调整发生较晚，到90年代，德国的传统政策、实践和公共话语更符合全球和欧洲发展的需要。从那时起，德国开始改变了自己的政策和实践，但至今也没有为其公共话语找到充足的法理基础的支持。

我原来计划出版一本可以汇集各国案例的书，但我很难找到既有时间又有经验的作者。我曾想组织6~7个研究欧盟主要国家的专家一起工作，但经过一番努力后，我终于放弃了这个想法。最后，我决定还是由我自己来做这件事。我顺理成章地选择了法国、英国和德国，因为这几个国家不仅是最大、最有影响力、最能代表战后三种经济治理模式的国家，也是我最了解的国家。最初，我还准备考虑意大利，后来终于放弃了。对读者来说，对三个国家的情况进行的比较就已经很难理解了，不必再加上意大利这个更为复杂的案例。然而，我在全书中比较其他国家

案例时会反复提到意大利。

作为一本关于欧洲的专著，本书尽量做到深度与广度相结合。本书对政治科学的主要领域均有所涉及，并试图缩小国际关系学与比较公共政策在政策变迁方面的分歧，试图缩小国际政治经济学与比较政治经济学在资本主义和资本主义制度认识上的分歧，试图缩小在思想与政策辩论文献中那些强调政策思路性质和起源的学者同那些更关注政策思想在政治与政策领域传导过程的学者之间的分歧。

在本书第一部分中，我试图用国际关系文献来说明：全球化和欧洲化造成的国家主权和控制权（national autonomy and control）的损失在很大程度上获得了超国家机构的共同控制权（shared control）的补偿。随后，我对公共政策进行了比较，以便确认那些有助于说明全球化与欧洲化不同影响的调节因素和欧盟特定的制度性制约因素。在本书第二部分中，我补充了国际政治经济学和比较政治经济学文献中的“资本主义多样性”（varieties of capitalism）理论。我试图证明，欧洲国家仍然在沿着战后形成的三种资本主义原始模式所约定的方向发展，当然，所有国家都在向市场化前进。本书第三部分中有我在方法论上最大的创新。我为公共话语（discourse）提出了一种新的分析框架，以便阐明各国在应对全球化与欧洲化时的政策和实践变革的政治动因（political dynamics of change）。在本书的结论部分，我对书中归纳的欧洲资本主义不同调整路径的主要论点进行了总结，并预测了欧洲资本主义的未来发展方向。

本书力图做到理论与实证研究的有机结合。我重点讨论了英国、德国和法国的政策，本书中关于实践和公共话语的章节可以独立存在，主要描述的是所发生的事实。当然，在理论部分章节中，这些都为所发生的事实提供了原因和方式（why and

how) 上的理论依据。在理论章节中概括的实例又在实证章节中被进一步探讨。这种做法看似有些烦琐, 但我的本意是通过由表及里、由外人内、由全局至细节的方式让读者更好地了解全书探讨的内容。这种理论与实证分析的有机结合使本书不仅对专家学者、研究生、大学高年级学生具有可读性, 而且对那些希望了解本书内容的普通读者也具有可读性。对于那些对用来说明理论的“故事情节”(stories) 并不十分熟悉的读者来说, 实证章节提供了必要的背景资料, 可以先读, 如关于政治学的第六章、关于实践的第四章和关于政策的第二章。

本书虽然主要探讨三个领域的理论问题, 但也以大量的实证研究为基础。在整部书中, 我不仅大量使用了间接的文献资料(secondary literature), 而且使用了统计数据、调查结果和其他类型的原始资料。除了非正式的谈话和正式场合的讨论外, 我还对来自欧盟、各国政府和企业界的高级官员进行了 40 多次的直接访谈。

这部书的孕育时间要比我原来预期的更长。在我决定独立完成而不是编辑一本书后, 许多年过去了。1995 年, 我在《戴达罗斯》(*Daedalus*) 发表的那篇讨论全球化与欧洲一体化对成员国影响的短文中首次透露出这种想法。为此, 我必须感谢斯蒂芬·格鲁巴(Stephen Graubard) 编辑。他坚持说, 我应当写一篇不仅仅局限于法国的文章——当时我正在研究法国的案例, 这使我找到了一个拓宽研究对象的借口。艾伯塔·史巴吉亚(Alberta Sbragia) 1996 年和 1997 年在匹茨堡组织的两次研讨会推动了我对全球化与欧洲一体化的理论方面的探讨, 我要感谢她和其他研讨会参加者提供的思路。我要特别提到彼得·卡赞斯坦(Peter Katzenstein), 他鼓励我在论点中更多地考虑构成主义因素(constructivist elements), 这成为后来对政策辩论研究的精髓; 我

还要提到弗里茨·夏普夫 (Fritz W. Scharpf)，他为我闯入这个禁区提供了重要的支持。当时我们就取得共识：必须对社会经济问题进行单独研究（我之所以提及此事，是因为我们共同完成的两卷本的《开放经济中的福利和工作》成为我推迟完成本书的一个借口）。还有其他一些学者，他们也在不同场合对政治经济问题提供了有价值的评论，其中包括参加各种研讨会和小型讨论会的学者，这些会议的举办方包括哈佛大学、欧洲大学研究院、伦敦经济学院、西雅图的华盛顿大学，当然还包括其他专业会议的参加者。在此，我要特别感谢加里·马克斯 (Gary Marks)、约瑟普·维乐 (Joseph Weiler)、安迪·穆萨维茨克 (Andy Moravcsik)、马克·撒切尔 (Mark Thatcher)、大卫·卡梅隆 (David Cameron)、阿兰·古尤玛奇 (Alain Guyomarch)、托马斯·里瑟 (Thomas Risse)、弗兰西斯科·迪纳 (Francesco Duina)、阿德里安娜·赫里迪亚尔 (Adrienne Héritier)、马丁·肖恩 (Martin Schain)、詹姆斯·卡帕拉索 (James Caporaso)、约翰·基勒 (John Keeler) 和雅克·勒·卡休斯 (Jacques Le Cacheux)。

在本书第二部分，即关于资本主义模式的部分，我从与此有关的形形色色的学术研讨会和小型讨论会中获益匪浅。我为此要感谢这些小型研讨会的参加者。这种活动的举办单位包括：柏林科学研究中心 (Wissenschaftszentrum)、欧洲大学研究院、伦敦经济学院和哈佛大学。除了上面提到的参加者外，我特别要提到以下参加者：沃尔夫冈·斯特里克 (Wolfgang Streeck)、鲍勃·汉克 (Bob Hancké)、苏珊娜·吕茨 (Susanne Lütz)、保莱特·库尔泽 (Paulette Kurzer)、琳达·韦斯 (Linda Weiss)、亨利·法雷尔 (Henry Farrell)、尤里希·格拉斯曼 (Ulrich Glassmann)、彼得·霍尔 (Peter Hall)、鲁卡斯·陶卡利斯 (Loukas Tsoukalis)、

戴维·索斯基斯 (David Soskice)、米切尔·戈耶 (Michel Goyer) 和佩珀·库帕尔 (Pepper Culpepper)。

本书第三部分讨论的是政策辩论在经济调整动因 (dynamics of economic adjustment) 中的作用, 除了那些我已经提到的学者外, 我还要感谢斯蒂芬·格鲁巴, 他要求我将 1997 年发表在《戴达罗斯》上的那篇讨论调整政治因素的文章进一步扩展。在这篇讨论政策辩论的实证论文发表之后, 我又进行了更多的理论探讨, 这种理论探讨得到了斯蒂芬·韦伯的鼓励, 他邀请我参加了伯克利加州大学的讨论会, 后来我又应约在其他不同场合发表了演讲。我要感谢参加伯克利讨论会的约翰·坎贝尔 (John L. Campbell)、保莱特·库尔泽、克里斯·安塞尔 (Chris Ansell)、尼克·泽格勒 (Nick Ziegler)、埃利奥特·波斯内 (Elliot Posner)、瓦纳·贡萨雷斯 (Vanna Gonzalez); 科隆马克斯普朗克学会 (Max Planck Institute) 的雷纳特·美恩茨 (Renate Mayntz) 和沃尔夫冈·斯特里克; 欧洲大学研究院的耶维斯·门伊 (Yves Meny)、马丁·罗德斯 (Martin Rhodes)、毛里基奥·费雷拉 (Maurizio Ferrera) 和菲利普·施密特尔 (Philippe Schmitter); 曼海姆大学的比耶特·柯勒-科奇 (Beate Kohler-Koch)、米切尔·柯诺特 (Michèle Knodt) 和法布莱斯·拉雷特 (Fabrice Larat); 我还要感谢布鲁诺·乔博特 (Bruno Jobert)、皮埃尔·缪勒 (Pierre Muller)、布鲁诺·帕利艾尔 (Bruno Palier)、让·雷卡 (Jean Leca)、马克·布莱思 (Mark Blyth)、凯特·麦克纳马拉 (Kate McNamara)、科林·海耶 (Colin Hay)、克劳迪奥·拉迪埃利 (Claudio Radaelli)、乔纳斯·庞杜森 (Jonas Pontusson)、阿米·沃登 (Amy Verdun) 和马丁·赫林 (Martin Hering)。

这部书的写作花费了许多时间。我要感谢波士顿大学宽松的

假期政策使我有时间在欧洲进行研究活动。我要感谢下列机构以访问学者的方式为我提供的帮助，包括巴黎的法国政治学院（Institut d'Études Politiques）、牛津大学奈菲尔德学院（Nuffield College, Oxford University）、佛罗伦萨的欧洲大学研究院、科隆马克斯普朗克社会研究学会（Max Planck Institute for the Study of Societies in Cologne）。

最后，我还要感谢布鲁塞尔和各国首都的政府官员、企业官员、新闻记者和学者们，他们在访谈和讨论过程中提供的思路对本书的写作很有帮助。我还要特别感谢下列人员，他们是：卡雷尔·范·米耶特（Karel Van Miert）、戴维·威廉姆森（David Williamson）、菲利普·德·舒塞特（Philippe de Schoothete）、多米尼克·斯特劳斯-卡恩（Dominique Strauss-Kahn）、米切尔·阿尔伯特（Michel Albert）、路易斯·施维茨（Louis Schweitzer）、让-路易斯·贝法（Jean-Louis Beffa）、安德烈·利维-朗（André Lévy-Lang）、米切尔·波恩（Michel Bon）、让·甘杜斯（Jean Gandois）、米切尔·墨特斯（Michel Mertes）、乔舒卡斯·费希尔（Joschka Fischer）、甘特·霍夫曼（Gunter Hoffman）、赫斯特·艾哈麦克（Horst Ehmke）、沃尔夫甘·泽（Wolfgang Zeh）、汉斯-奥拉夫·亨克尔（Hans-Olaf Henkel）、阿尔布里切特·缪勒（Albrecht Muller）、诺伯特·魏泽雷克（Norbert Wieczorek）、汉斯-伊里奇·克劳泽（Hans-Uirich Klose）、哥特·珀普（Gerd Popper）、希尔玛尔·科佩尔（Hilmar Kopper）。还有其他许多人，他们的名字无法在此一一列举。我要感谢蕾妮·哈费尔坎普（Renée Haferkamp）为我安排了剑桥的采访活动并提供了进入布鲁塞尔的机会。我还要特别提及：许多在正式和非正式场合提出的评论和观点都被用于本书的撰写。在我上面提到的朋友中，我还要再次提及他们，感谢他